

七八年高考回忆

经过了十年文革动乱以后，一九七七年冬恢复了高考。我那时正在上高一，马上就满十五岁。在此之前我和同学们担心的是去什么地方下乡当知青。前一级的学长学姐们有不少初中毕业后就下乡去了，为的是能早一些回厂当工人。高考的恢复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七七和七八两年的高考没有年龄和学业的限制。七八年高考时学校让我们几个优等生去参加，好积累一些考试的经验，第二年高考时可以考的更好。没想到我居然考上了大学，人生又发生一个转变。

我当时是在四川省泸州天然气化工厂的子弟学校读书。老师中有不少是反右时流放到我们学校的。他们都有能力和眼光。邓小平一上台，学校就开始要求学生好好学习。我们的大学和初中都是在文革中度过过的，根本不学习，天天就是学工学农，老师都不敢教书。我们初三的时候用了半年的时间突击补习初一、初二的数学和语文。这给了我比较扎实的数学基础，不光是考上了大学而且轻松地读完高等数学。

学校把我放在理工科，因此只需要准备数理化。当时有句话说，“读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为只是预考，我们也没有什么压力。我又喜欢数学和物理，所以也没有觉得辛苦。

高考的前一天，我们从安抚镇坐车到泸州市里的一个招待所。第二天一早我们排队走进考场。上午考完后回到招待所午休，然后又排队去考场。我们一共考了三天六门科目。

最后一天下午考英文。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准备。发下考卷一看，里面没一个懂的。几分钟后选择题都填完了。但考场规定至少要做半个小时。我们就只好干等着发呆，等到半个小时后大家一拥而出。

接下来就是等分数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当时我们可以选择五所重点大学和五所非重点大学，每个大学可以选两个专业。但是这些是在考试以前就要选定的，所以选什么大学和专业就有讲究了。好在我没有指望考上，所以我就按专业选了十所大学。我选的专业是自动控制 and 数学。

九月初录取通知书开始下来。我们每天晚上在邮局等着信件，不时有人兴高采烈地拿到录取通知书，但多数人都是空等一场，只好不安地回家，第二天又等在邮局。我的高考总分是刚刚上了重点大学的分数线，没有希望能上我选的重点大学。但是许多非重点大学的通知书已经下来了，我还是没有等到。

九月底，我终于拿到西安公路学院现在的长安大学的通知书。我的数学成绩不够好没有被数学专业录取，但自动控制专业录取了我。不知为什么我的通知书下的这么晚，那时大学已经开学了。入学以后才明白数学专业是培养教师的，幸亏我没被录取。

镇上还有一个学生也考上了公路学院，我们决定结伴去学校。我们先坐汽车到隆昌再坐火车到到西安。出了火车站没有找到接我们的人，我们只好坐公交车到了一个离学校最近的站。下了车正好下起了大雨，我们抬着行李高一脚低一脚地沿着泥泞的土路走到学院的宿舍楼。

我们班上一共二十四人，编号是自控7801班。专业的全称是交通工程自动控制专业。我们是这个专业的第一班。公路学院是交通部属下的。当时国家计划修建高速公路，我们这个专业是专门为这个计划设置的。可是到了大三的时候，高速公路

还是遥遥无期。学院就把我们计划中的专业课改为电汽工程专业的基础课。这样我才有可能后来考上重庆大学电机工程和计算机系的出国研究生。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我们班上年龄最大的同学是二十九岁，也是我的四川老乡。他下乡也当过工人。最年轻的同学才十四岁，刚初中毕业，上海人。但他后来留了一级，毕业时我就是班上最年轻的。不过后来的同学聚会，我们还是算他是我们一个班的。

班上不少同学都下过乡，上大学完全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他们不再是一辈子当农民或工人，而是可以当上工程师或国家干部。我们那时还是国家统一分配，上了大学意味着将来的工作有保障。所以他们珍惜学习的机会，读书都很刻苦。

我们白天上课，晚上复习和做作业。教学楼的二楼有一个图书室，里面有报纸和杂志。我每天晚上都会泡在那里看杂志。最喜欢的是《译林》，都是翻译的外国小说。它让我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生活。但每当图书室关门，我不得不回到班里的教室时，看到同学们都在安静地学习，总有一股不务正业的内疚感。

当时流行的文学类型是所谓的伤痕文学，主要是描述知青的不幸遭遇。这些小说让我意识到政府一直在欺骗我们。我们是在谎言中长大的，而且仍然活在谎言当中。该怎样识别谎言，怎样在谎言当中找到真实的东西呢？

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范围的大讨论。文革十年我们被洗脑，毛泽东就像神一样，他的话就是金科玉律。但是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却说，他的话不都是真理而应由实践来检验。这是把毛拉下神坛的第一推力。

这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始。当时的学者和大学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实现而奋斗终身，现在我们在思考什么是共产主义？毛的功过，文革是对还是错？当时的感觉是，突然之间黑的变成白的、白的变成黑的。许多的观念和已知的事件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

我有幸参加了七八年的高考，有幸与我许多的学长学姐们一同生活了四年，有幸经历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特别是学到了辨别虚假和荒谬的能力，以及批判媒体的习惯，这使我后来的人生受益匪浅。还有就是遇到了我后来的妻子，她的见识和智慧一直在帮助我。

恢复高考不仅仅是大学教育的恢复，也是标志着中国走出了毛时代的黑暗。



作者：石平南



时代追忆——写在恢复高考40年

文/曾庆强

1975年8月25日，广东韶关市迎来了历年来人口最多的上山下乡运动，74届和75届的高初中毕业生达五万知青奔赴韶关市郊和曲江县的各个村庄和农场。那年我十八岁，和十五岁的弟弟一同奔赴广阔天地，弟弟去了国营茶场，我去了曲江县樟市公社樟市大队魏屋生产队。市政府拨给生产队每位知青一百块钱的安家费，用于住房、厨房用具、农具，第一年发给每人每月八块钱和二十八斤大米，第二年后再无生活补贴，由生产队分口粮。我们是产粮区，每到夏收和秋收，累不算，眼看那金灿灿的谷子绝大部分都往粮库送，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我们长年吃不饱，那三分自留地还受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限制，卖给国家的稻谷是七分钱一斤，一年结余下来一个工分只不过是六分钱。那几年我们每年只能分到四百五十斤的稻谷，一天四角八分钱的收入。

在中学里我是个学生干部，还是个挺守本分的孩子，但到了农村，每到过节回家都舍不得花钱坐车，因生活所逼也学会了爬货车。那是挺危险的动作，因为如果拦路搭便车，司机根本就不会停下了，除非是女知青。爬货车就像电影铁道游击队里一样，当汽车上坡减速时，飞身抓住货车两边或后边的护栏，翻身钻进车厢，司机知道没办法，也就不管了。其实也管不了，他还怕我们揍他呢。有时也会走八公里的路程到乌石火车站，然后坐“霸王”车回韶关。有一次从村里走路到火车站，途经广州知青地盘的消雪岭茶场时，某些广州知青还追着我们打，幸好我们跑得快没给打着——当时广州知青和我们韶关知青是仇家，互相见面就打架斗殴。那两年半的农村生活除农活外，我们还兼管电工、机械修理工、农科技术员和理发员。

1977年10月底，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马上回城找课本复习去。姐姐鼓励我说，如考上大学就送我她手上那块手表。那几天我就像发疯一样，听到哪里有高考辅导的，就往哪里去听。那时的老师也真好，都是免费。晚上就伙同好友李亚胡、林运坚一同解数学和物理题，但好景不长，不到两个星期，知青干部李叔就挨门逐户把我们抓回农村参加冬季修水利汇战。其实后来也没有什么时间复习，有空就做了点数学题。

1977年12月，高考前一天，我背着棉被走了八公里的路去到乌石公社。那年罗坑公社、樟市公社、消雪岭茶场、乌石公社和大坑口镇的考生全被安排在乌石公社小学考场，乌石公社腾出公社大礼堂，地上铺满了厚厚的稻草，好让我们这些外地考生睡得舒服。第二天早上提前半小时来到乌石公社小学高考考场，眼前黑压压的人群。那时也不紧张，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因为如果考不上就等着



1977年准考证



摄于1981年-湛江医学院七七级三班同学

招工招兵嘛，还有一条出路是偷渡去香港。大家知道，国家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中段过每天三趟列车货物到香港的运输。那年年底知青里开发了一条新的偷渡香港途径，就是在铁道车站里找到去香港的货运车，躲藏在货物里，过了边境再看时机出来。邻村一同学过了境后跳车时摔死了，我小弟则则在罗湖口岸给翻出来，理了个光头，遣送回家。当然，还是有不少成功越境的，现在仍以港商身份回内地经商。

三天的考试，我自信得很，跟同学对题，数学好像都做对了。到成绩下来时，数学果然得了97分，政治是67分，语文不及格是48分，其他忘了。我记得那年广东高考分数线上线后，很多都还未未必能上大学，广东只有4.7%的机率，我幸运地被湛江医学院（现改名为广东医科大学）医疗系录取。入学时我串联另一位到湛江水产学院（现改名为广东海洋大学）入学的中学同学张振汉，为省钱，坐火车经湖南衡阳、绕道广西到广东湛江。这要比从广州坐汽车到湛江便宜几块钱。

1978年3月，我带着我姐送我的手表来到了美丽的南海之滨——湛江市。学院根据每个新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每月给了我8块钱人民币的生活补

高考四十年稿件征集启示：
四十年的那一声惊雷，改变了中国千千万万年轻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正是这一批人，后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建设的中坚力量。

想来在中国历史上，77、78级考生应该是最与众不同的两届，在全国上下史无前例的十年政治大动荡之后，这群人带着不同的故事与经历，奔进了考场。

如今这些人多已进入花甲古稀，回望当年，想必诸多唏嘘感慨。本报诚征集“高考四十年”稿件、图片，拟编辑成书，以纪念那段非常之岁月。来稿请寄：whlee@iupui.edu; aatodayin@gmail.com